

中唐文人

日常生活与创作关系研究

彭梅芳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唐文人日常生活与创作关系研究

彭梅芳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唐文人日常生活与创作关系研究/彭梅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7

ISBN 978-7-01-009793-0

I. ①中… II. ①彭… III. ①社会生活-关系-文学创作
-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4685号

中唐文人日常生活与创作关系研究

ZHONGTANG WENREN RICHANG SHENGHUO YU CHUANGZUO GUANXI YANJIU

彭梅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7.25

字数:229千字 印数:0,001-2,500册

ISBN 978-7-01-009793-0 定价:38.00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本书出版得到华南师范大学 211 项目
“文化生态与中国语言文学的古今演变” 的资助

内容提要

中唐以来,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文人身受社会世俗化浪潮和佛教禅宗思想等方面的影响,心态渐趋务实并日益走向世俗和日常生活世界。与此相对应,日常生活题材在中唐文学中增多,文学呈现出崇实、尚俗的趋向。在此前提下,本书尝试从中唐文人日常生活的角度,考察处于现实生活中的文人的生活心态、审美情趣以及在这些心态和情趣影响下的文学创作特点。

大体来说,中唐文人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互为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方面,中唐文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是文人作为生命个体生存的寓所,它为文人提供了生存所必须的熟悉感、稳定感和安全感;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给走向世俗的中唐文人提供大量的文学表现题材资源;日常生活中所积淀的日常观念、日常思维与常识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文人的创作观念、文学思维和文学风格的形成;日常生活中传统的、非理性的文化因素,容易滋长走向日常世界的中唐文人的保守和惰性,由此对文人的开拓性和创造性带来负面的影响,从而使得文学创作具有了走向平庸的潜在危险。另一方面,中唐文人的文学创作日益以日常生活内容为表现对象,原本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经过文学作品的提炼与升华,能焕发出一种美感;中唐文人在文学创作中表现日常生活内容,也逐渐带动了文人对日常生活的改造。

围绕本书两方面的研究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本书分五章进行

论述。第一章综论中唐文人日常生活和创作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从总体着眼,根据社会历史、文学演变的进程,分中唐前期、中唐中后期两个阶段对中唐的主要文人的诗歌创作进行分析,由此考察日常生活因素在中唐诗歌中的生长、演进情况,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唐诗歌的日常化和世俗化的特征渐趋明显。

第三章以中唐文人的日常饮食、服饰、居住环境等日常物质生活层面为切入点,通过考察中唐文人在衣、食、住方面的习惯以及相关审美趣味的转变,进而探讨这种转变给中唐文人的文学创作风格和文学思维带来的影响。中唐文人在日常物质生活方面日益表现出清简、疏淡、素雅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对中唐文学风格的形成不无影响。

第四章围绕中唐文人的日常文化生活层面,从雅琴、棋弈、书法等三方面观察中唐文人的文化喜好和由文化偏好透露出来的文艺审美趋向。认为,古琴在中唐文人群体中的复兴以及文人对琴的“淡”、“古”、“悲”、“缓”等美学品质的注重、讲求沉思默想的围棋在中唐的盛行和中唐书学中对笔法的强调,皆体现了中唐文人的精神和气质特点,也预示着中唐文学的审美走向。

第五章以中唐文人的日常公共生活为中心,从亲友日常交往的角度分析中唐“父子兄弟同以文名”现象以及中唐文人的结群现象;中唐文士在仕宦生活中,从早期的关心时务渐渐变得不乐曹务,他们日益疏离公共领域生活并走入私人小天地,精神偏于收敛、低调,而文学视域也变得狭窄,这对中唐文学的风貌不无影响。

余论补充探讨中唐文人日常生活的打破与重建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中唐文人 日常生活 审美观念 诗歌创作

ABSTRACT

Effected by the wave of secularization of society and the Zen idea of Buddhism and other aspects, literati in the mid – Tang became more pragmatic and walked up to secular and daily life world gradually. Correspondingly, daily life increasingly became the subject of mid – Tang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ture style presented a pragmatic and secular tendency. On this premis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tudy the life mentality of literati in the real world, aesthetic taste, as well as literature sty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entality and tas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 of mid – Tang literati.

Generally speaking, the daily life world of mid – Tang literati was the survival foundation of literati, and it provided them with the feeling of familiarity, stability and security. Complicated world of everyday life can give many resource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literature works to secularized mid – Tang literati. Accumulation of daily life in the day – to – day concepts, day – to – day thinking and common sense has an imperceptible influence on the creative concept of the literati,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style. Traditional and non – rational cultural factors in daily life can make literati fall into the habit of conservatism and inertness, therefore, the literature writing moved towards mediocrity because of the gradual loss of pioneering and creative abilities. The contents of literature works were increasingly

flooded with daily life. The daily life, seeming prosaic, but through the distill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literature, can radiate a sense of beauty. The presents of daily life in literature works also lead literati to transform the everyday life.

Focusing on both aspects of the study, this paper carried out on five sub-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focuses on the main relation between daily life and literature creation of literati in mid-Tang. Chapter two mainly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daily life presented in literature works by analyzing the poetry writing of main literati in mid-Tang, dividing into three time-periods. Generally, the number of mid-Tang's poetry which took daily life as the writing subject, became larger, and the style of those shows more and more secular trend over time.

Chapter three focused on the daily foods, dressings, living environment etc. From the related customs and the taste conversion, the effect of these changes on the literature style and thinking of the mid-Tang literati were studied. They favored a simple but elegant taste in material world. This taste affected the formation of literature style.

Chapter four focused on the routine culture life. From gustoes of violin, chess, and calligraphy, the favorites of the mid-Tang literati i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taste, which can be seen from favorites in culture, were studied. Reviv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olin, literati's interest in the violin's aesthetic characters of "simplicity", "antiquity", "sorrow" and "leisureliness", popularity of I-go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pondering, and the emphasis of techniques in using brush pen all represented the mid-Tang literati's spirit and temperament and predicted the literature taste trend.

Chapter five focused on the public life. From the intercourse of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 phenomena of "one family, several literati" and literati'

clique were analyzed. They converted their interest from public affairs to individual lives. Their spirit tended to be humble and literature confine shrank, which definitely affected the literature style.

The rest of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effect of break – up and rebuilding of literati' routine lives on the literature works.

KEY WORDS: mid – Tang literati daily life aesthetic ideas poetry writing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中唐文人日常生活与创作关系综论	26
第一节 中唐文人日常生活与创作关系概说	26
第二节 中唐文学创作对日常生活的表现	30
第三节 日常生活对中唐文人创作的影响	35
第二章 中唐文人日常生活题材诗歌分期考察	42
第一节 至德至贞元初	43
第二节 贞元中至元和、长庆年间	55
一、权德舆	58
二、“韩孟诗派”	63
三、柳宗元和刘禹锡	75
四、元稹与白居易	91
第三章 中唐文人食、衣、住与文学的新变	109
第一节 文人日常饮食观念与中唐文学新变	110
一、文人饮食观念、习惯的改变与审美趣味的演变	112
二、日常饮食题材诗歌新变	121
三、柳宗元日常饮食与文章“奇味说”	129
第二节 中唐文人日常服饰与文学创作	134

2 中唐文人日常生活与创作关系研究

一、“儒服”描写与中唐文人的自我价值意识	136
二、中唐文人服饰及其文化内涵	142
第三节 中唐文人居住环境与文学创作	153
一、中唐文人居住环境的选择	153
二、文人居住观念的整合与思想变迁	161
第四章 中唐文人日常文化生活与文学	174
第一节 琴与中唐文人审美趣味的演变	177
一、琴在中唐文人生活中的复兴	179
二、琴的复兴与中唐文学审美倾向	187
第二节 棋弈与中唐文学	193
一、弹棋、围棋的兴衰交替与唐代文人气质的转化	194
二、韩愈的棋艺偏好与文学风格	202
第三节 书法与中唐诗歌审美倾向	206
一、中唐文人书法概况	208
二、文人书法与文学	213
第五章 文人日常公共生活与中唐文学创作	218
第一节 中唐文人日常交往与中唐文学景观	219
一、文人的日常交往困境与文学的别样发展	219
二、亲族交往与中唐“父子兄弟同以文名”的文学景观	226
三、文人结群意识的加强与中唐文学	231
第二节 从勤于公事到不乐曹务：中唐文人的“独善”之路	236
一、实干风气与中唐文人心态	238
二、中唐文人独善之路及处世心态	241
余论	245
主要参考文献	251
原后记	262
后 记	266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研究现状

(一) 问题的提出

唐代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交叉综合作用促成了唐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这是唐代文学研究者的共识。因而在大的文化视野下,通过深入探讨各方面的社会因素,如政治、艺术、宗教、风俗等与唐代文学的内在联系来阐明唐代文学演变的轨迹以及规律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①而事实证明,将文学与社会文化各方面结合起来研究往往能使研究的背景扩大;从不同侧面解读文学,可使研究更深入、更立体化。

文人创作与时代、社会生活关系密切,《文心雕龙·时序》即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②文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创作必然受到“世情”和“时序”的影响,从而烙上时代生活的印记。“世情”和“时序”的改变给人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在于逐渐改变着人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模式。然而,在文学研究中,日常生活对文人创作

^① 关于古代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的相关问题,可参见戴伟华师《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6期。

^②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9页。

的影响却常常容易被忽视。一直以来,它常被视为文人创作的预设背景,也正因为如此,文学研究者对它并没有投注多少目光。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制度、宗教、艺术等因素对文学带来的影响则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重点。其实,以上诸种因素对文人创作产生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靠引发文人日常生活的改变来实现的。可以说,日常生活对文人创作起着一种最直接的作用。众所周知,文学源于生活,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皆可成为文学创作的表现题材。与此同时,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日常观念、日常思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文人以及文学接受者的观念和思维,这种影响必然会反映到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上。在中国,日常生活与文学的关联尤为明显。中国人善于过生活,这一点早已为中西方学者所公认,例如,唐君毅先生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就曾提及:“罗素著《中国问题》,极称中国人之善过生活,谓此由于中国生命中无‘预定之成型’(Prepared pattern),故能观照领略一切生活而不厌。林语堂以西文著《吾国与吾民》及《生活之艺术》,特重发挥中国人最平凡之日常生活中艺术性之趣味。”^①而唐君毅本人也认为:“中国人虽较缺超越日常生活,以求精神文化生活之精神;然亦特善于使日常生活之美化艺术化,使之含文化意味。”^②就文人阶层而言,他们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大规模关注,以及将日常生活诗意化的尝试在中唐开始明显化。因此,在中国重视日常生活的背景下,联系中唐文人走向日常生活的现象来考察他们的文学创作当具有一定意义。其实,结合文人日常生活来考察文人创作的文学研究模式早已有之,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此文所开拓的文学研究模式值得借鉴。

唐王朝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唐人的生活对比前朝更加丰富多彩,这在众多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反映,而在

①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177页。

②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167页。

唐代社会生活中十分活跃、善于捕捉生活细致之处的人文阶层更以他们的生花妙笔对此时段的生活做了别样的记载。有唐一代,文人都热衷于以诗文来反映生活,但以安史之乱为界,文人对生活的关注各有偏重。典型的盛唐诗人大都关注超越日常生活的、理想化的事物,他们对超凡脱俗的事物、境界和精神孜孜以求,对现实生活中的平凡的事物则较少投注目光。此特征反映在他们功业理想的追求方面,则表现为常常不执着于按部就班地获取功名,他们或佯狂傲世、入塞求功,或以退为进、走终南捷径。而在文学创作的取材方面,他们对琐屑、惯见之物以及日常重复性的世俗情状兴趣不大,因为这些在他们看来是处处可见的,这些事物与世情也因为普遍、理所当然而掩去了它们的特殊所在。如果说他们作品中也有对当下情况的描写的话,则其关注点往往落在追求物质、情感的自我满足和与众不同上。而中晚唐文人则较为贴近现实,心态也走向务实。在功业的追求方面,中唐文人学子大都不企求有捷径可走,他们大都先汲汲于科举以获得官职,然后再一步步地争取升迁以达到有所为的理想。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不刻意回避俚俗,其文学表达方式也更加坦率直露。中唐文学的这一新变,罗宗强先生曾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以“尚实、尚俗、务尽”^①归纳之,确是。

大体来说,中唐文人对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事物,如衣食、器物,以及种种家居琐事,大都能体味其中的小趣小乐,而不以浅俗舍之。到了中晚唐,文士更将日常用品与文房雅物并举,例如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序中就记载中晚唐文士张彦远在《闲居受用》一书中一边论文房清供,一边谈及醋、盐、干肉等食品种类,其雅俗杂糅的观念可见一斑。唐代文人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日常化、俗白化的趋向,这在杜甫中晚年的诗歌中开始日趋明显化,正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所言,在杜甫那里,“一

^① 见该书第七章《中唐文学思想》,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69页。

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① 平凡的日常生活 在杜诗中也能绽放出别样光彩，如“老夫清晨梳白头，……握发呼儿延入户”^②、“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③、“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④、“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⑤等便是对日常家庭生活的生动勾勒。到了中唐，以日常细事入诗的情况则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例如白居易即好在诗中说衣食俸禄、睡觉沐浴等事，在他看来，“惟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⑥，此外，在常人看来琐碎的家庭生活，在白居易诗中也变得有滋有味，其乐融融，例如《二年三月五日，斋毕开素，当食偶吟，赠妻弘农郡君》诗云：“以我久蔬素，加筯仍异粮。魴鳞白如雪，蒸炙加桂姜。稻饭红似花，调沃新酪浆。佐以脯醢味，间之椒薤芳。老怜口尚美，病喜鼻闻香。娇騃三四孙，索哺遶我傍。山妻未举案，馋叟已先尝。”^⑦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评此类诗为“家人琐语”；韩愈虽号雄文大笔，并认为“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⑧，然他对“铺床拂席置羹饭”（《山石》）、“呼奴扫地铺未了”^⑨（《郑群赠簟》）等细、俗之事也津津乐道，甚至连牙齿脱落也大书一番（见《齿落》），由此可以窥见中唐文人独特的创作趋向。而在散文创作方面，中唐的古文运动努力将文提高到“道”的层次，高呼复古并务去陈言，杜绝与时俗流文为伍。如此主张旨在维持“文”的纯洁性与神圣性，使文脱“俗”，然而，若对所谓的“古文”进行推敲，不难发现，它们在语言方面无疑比被古文运动者目为“俗文”的骈

①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464 页。

② 杜甫：《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杜工部诗集》，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163 页。

③ 杜甫：《投简成、华两县诸子》，《杜工部诗集》，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165 页。

④ 杜甫：《百忧集行》，《杜工部诗集》，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168 页。

⑤ 杜甫：《进艇》，《杜工部诗集》，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448 页。

⑥ 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白居易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99 页。

⑦ 《白居易集》，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825 页。

⑧ 韩愈：《答刘正夫书》，《韩昌黎全集》卷十八，中国书店 1991 年版，第 264 页。

⑨ 韩愈：《山石》、《郑群赠簟》，《韩昌黎全集》，中国书店 1991 年版，第 46、60 页。

文更加接近日常语言,也即更具有世俗性。不仅如此,中唐以来,文章的实用功能也得到了加强,如墓志、赠序、书启之类应世谐俗的文体在中唐文人的散文创作中占据的比重相当大。如此一来,文章中展现世俗生活、表达日常情感的成分也相应增多。

中唐文人在创作时走出崇高的理想殿堂而迈入平凡的现实世界,此现象可以说是中唐以来社会日益掀起世俗化浪潮的表现之一。中唐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社会各方面的变迁引发了文学观念的演变。清代叶燮在《唐百家诗序》中即言中唐乃“古今百代之中”、“吾尝上下百代,至唐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①而在中唐的诸多变迁中,文化的下移和逐渐形成的世俗化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对文人的创作观念产生了影响。对于中唐以降的文化转型,迄今学界早有认识。其中,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影响颇深远。他认为,唐宋之间,贵族势力式微而庶民力量崛起,贵族式的文化衰颓而平民阶层文化逐渐兴起,以往主要迎合贵族的绘画、歌舞等文艺形式也日益以迎合平民趣味为趋归^②。陈寅恪先生也认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亦莫不如此”。^③在始于中唐的文化转型中,文人的精神风貌、道德操守和价值观也相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美国汉学家包弼德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便认为,唐宋的社会转型是士或士大夫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逐步从门阀士族向文官再向“地方精英”转变的过程;唐宋思想文化转型是从唐代基于历史文化转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观,文化权力从中央向个人转移,强调个

① 叶燮:《已畦文集》卷八《百家唐诗序》,清康熙叶氏二弃草堂刻本。

② 关于内藤氏的相关学说,参见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至于内藤此说给中外学界带来的深远影响则可参见张广达先生的《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一文。

③ 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2页。

人自我修养的意义。^① 在世风变迁、文化世俗化趋势影响下的中唐文人在文学创作上风格之变更同样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例如蒋寅《大历诗风》^②、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③、吴相洲《中唐诗文新变》^④、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⑤以及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⑥等书均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和论述。文人作为具有敏锐的感受力的社会精英群体,文化下移、世俗化浪潮给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无一不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在此情况下,他们顺应社会文化主潮,将周遭的日常生活纳入文学题材并借此表达真正属于自我的、私人化情感体验,这也是很自然的。

此外,中唐文学中日常生活因素增多与洪州禅在文人群体中的传播与影响不无关系。洪州宗的创始人马祖道一(709-788)师承六祖慧能“众生皆能成佛”的思想,据曾与道一交游的权德舆的《唐故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并序)》所记,道一常言:“佛不远人,即心而证;法无所著,触境皆如。”^⑦邱元素《天王道悟禅师碑》记道悟游谒马祖之门,道一以“识取自心,本来是佛。不属渐次,不假修持。体自如如,万德圆满”^⑧数言悟之。由此可见,马祖道一在肯定禅宗的心性观的同时否定了北宗的渐修功夫,他主张“即心即佛”、“触境皆是佛法”。与此同时,道一更将禅宗推向世俗,他在教导信徒时称:“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只知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万法皆从心生。心

① [美]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 吴相洲:《中唐诗文新变》,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⑤ 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 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261页。

⑧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4页。